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记忆与阐释”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18年7月20—21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联合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记忆与阐释”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讨论会,共有40多位中国和香港、日本、欧美国家的学者参加了讨论,与会者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与阐释、抗日战争时期的内政与外交、日军暴行记忆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文挑选一些和中国抗战关系直接的论文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与阐释

抗日战争记忆层次丰富且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高士华的《中国抗战记忆的区域性》一文提出,在抗战记忆重构中,区域记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东北地区、台湾地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的抗战记忆,指出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个人和国家记忆,区域记忆受重视程度不够,当区域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国家以及学者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处理好区域记忆和全国记忆之间的关系。

东京大学石井弓的文章《抗日战争记忆的多层性——以“汉奸”的记忆为中心》聚焦山西孟县,以当地对汉奸的记忆为中心,探讨了抗日战争记忆的多层性。中国的抗战史叙述中,汉奸的形象是单一的,逐渐成为集体记忆和情感记忆。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在汉奸问题研究上有了一些成果,但研究对象多为处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大汉奸”,该文则对关注较少的、处于沦陷区的各类底层汉奸进行了考察。作者深入孟县,对村民及汉奸家人进行了200余例实地采访,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和口述材料为基础,尝试对沦陷区和日军制造的无人区的汉奸形象进行重构。无人区是中共军队、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势力的交错区域,也是各方争夺的重点。村民中流传的顺口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村庄在战争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实态。作者认为,顺口溜便于记忆,数代人口耳相传,反映了村民们的共同情感、共同记忆,能够反映史料没有记载的史实。作者通过分析汉奸及其家人的口述材料,补充了顺口溜未承载的其他记忆,勾勒出该区域战时农村记忆的基本面相。

南开大学江沛以《苍生何辜:十部日记呈现的中国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探析》为题,关注了日伪政权统治核心区的平民生活,讨论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人性视角与传统的民族—国家立场相结合的理论问题。作者考察了施明德《辙印深深》、董毅《北平日记》、颜滨《我的上海沦陷生活》等十部抗战时期沦陷区普通民众留下的日记。透过这些日记,作者从战争创伤、区域差异、阶段差异、民

众心态、经济状态和日常生活六个方面,勾勒出沦陷区普通民众的日常形态。作者认为,这些底层民众留下的史料,与现有的对沦陷区的叙述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从史料来源、研究者立场和战前、战时社会经济状态等方面分析差异原因所在,作者提出,激烈的反抗形式并不一定是沦陷区的政治常态。在沦陷区日伪强权统治下,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使得缺乏民族—国家意识的普通民众难以积极表达自己固有的政治理念,他们会选择成本较低的暗中反抗甚至是“日常反抗”方式。表面顺从与变相反抗,共同构成了沦陷区民众的基本形态与逻辑。

北京大学臧运祜《关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一文分析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作者从近代中日关系的大局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宏观与总体考察,结合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演变和中国国内政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九一八事变“结束”后,中日关系一度平稳,但通过研究日军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的“华北谋略”以及分析《塘沽协定》的“启后”意义,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华北政策、向华北扩张的开端标志。中日关系平稳期,广田弘毅的“协和外交”、有吉明的“水鸟外交”等,对于缓和中日紧张关系有一定作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汪精卫、唐有壬、黄郛等亲日派的妥协外交,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华北事变”是中日全面开战的根源所在,不但结束了《塘沽协定》以后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局面,也把此后的中日关系推向了剑拔弩张的高度紧张期,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走向全面抗战,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结局。

比较视野下的抗战记忆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牛津大学米德(Rana Mitter)以《变化中的记忆——中欧二战记忆的比较》为题,比较了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和欧洲的二战记忆。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日益全球化,但在欧洲,二战的亚洲层面还没有得到充分了解。作者通过回顾欧洲二战史研究的一些要素,分析了可为中、欧的对比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法,主要包括:大规模暴力及其对社会变动的影响、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对战争的认识、以及愈发受到重视的性别史和社会史研究视角。

牛津大学聂洪萍详细介绍了伦敦—重庆大轰炸联展,通过图片展的方式,呈现伦敦和重庆这两个二战重要城市在法西斯侵略者轰炸下的实态,是学术界以多样的形式表述抗战记忆的良好尝试。

哥本哈根大学何铭生(Peter Harnsen)提交的《“战争!到处是战争!”:戈培尔日记中的第二次中日战争》通过考察约瑟夫·戈培尔日记,重构出纳粹精英分子的对中国抗日战争印象。戈培尔日记是纳粹核心人物政治活动的重要记录,更是透露纳粹党人的思索、信仰、误判与妄想的绝佳材料。同时,因为戈培尔不是纳粹战略方面问题的核心人物,因而可以说日记是纳粹高层讨论会中“旁观者”的记录。作者认为,戈培尔早期(约1921—1934年)对中国评价整体上较为正面。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数月,已经逐渐展现出强烈的支持日本的立场,希望通过日本的侵略遏制苏联。随着战事的推进,戈培尔明显愈发支持日本。但时至1940年,他逐渐意识到,中国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日本已经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淖,对苏威胁也远不如此前预想。论文同时讨论了1937年希特勒决策转向积极支持日本的立场,可能比学界此前推测的要提前半月,应为1937年8月1日。

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的论文《官方阐释的变迁与“抗日战争史”地位的上升——1949年以来“抗日战争史”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刍议》将目光投向了关注较少、研究仍有缺失的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即中国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抗日战争史的。文章考察了1949年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建国至今,中国官方对抗日战争史态度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改革开放头10年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受日本历史认识变化的直接影响,抗日战争史逐步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越来越受到官方重视,但在不同时期也展现出不同特点。同时,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评价,也愈发客观。作者提出,中日两国对历史认识

问题的态度会相互作用,既可能给对方带去正面影响,也可能给对方造成负面影响。避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恶性循环,应是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内政与外交

在中共抗战方面,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撰写的《整风运动的心灵史》通过对整风运动中反省报告及个人日记的剖析,将这样一场曾经在当事者心中掀起巨大思想风暴、触及个体灵魂的运动,从心灵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整风运动在中共历史的书写上,地位非同一般。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政治原则、组织纪律、意识形态等方面,甚至对中共新的政治文化的创造,也具有持久和普遍意义。文中提出,整风运动是一场以人的观念、思想作为直接整顿对象的运动。经过整风,中共组织更加细密,纪律更加严明,思想更加统一。更重要的是,整风运动造就了一代人,他们不仅在思想原则上听从党的指导,而且在个体选择、个人生活上自觉按党的期望和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对党完全忠诚的透明人,实现了共产主义政党提倡和期望达到的目标。整风运动不仅在组织上打造了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政党,更使党员在内心深处保持与党的一致。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的论文《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详细梳理了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38年《论持久战》发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文章分几个阶段进行考察,回答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所阐述的战略思想具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问题。同时,还对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了探讨,提出毛泽东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

与此相呼应,南京大学陈谦平的《蒋介石与中国局部抗战》考察了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局部抗战策略。作者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形成了国民政府局部抗战局面。文章还对传统的八年抗战说以及蒋介石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实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认为蒋介石采取的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是蒋介石深思熟虑的结果,也符合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一政策的着眼点在于抵抗,交涉是手段,是为了拖延日本展开全面侵华的时间。交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抵抗,是为抵抗赢得宝贵的时间,来进行抗日战争的各项准备。

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题为《1945年重庆黄金提价舞弊案》的论文以话剧《清明前后》禁演事件为引子,详细梳理了1945年国民政府黄金提价舞弊案的具体情况,并以此切入,分析了战时大后方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作者指出,黄金提价泄密案不是一桩普通的舞弊案,它牵涉人员众多,官员的职务亦甚高,同时还具有官商勾结、集团犯罪等特点。该案说明贪污腐败在大后方已成为系统化、体制性的严重问题。抗战胜利后,腐败像癌细胞那样,迅速在国民党内和国家政权的肌体中扩散蔓延,对国民党造成了致命性的影响。

复旦大学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财经关系中的合作与博弈》一文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美财经关系中的合作与博弈的复杂面相。作者认为,中美财经关系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具体案例涉及的数额越来越大,情况日益复杂,双方的合作是主流,是趋势。但博弈不时发生,并趋于常态化,有时甚至会发生较大的分歧和冲突,但是基于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和利益,博弈最终得到管控。

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的论文《未严格执行的禁运——滇缅路封锁前后的中英缅关系》考察了1940年7—10月前后的中英缅关系。1940年7月,在日本的胁迫下,英国宣布暂时封闭滇缅公路3

个月。学术界过去关于英国封锁滇缅路的评述,多侧重于英国对华不友好的一面。通过考察,作者认为,从滇缅路封锁前后中英缅双方交涉、交往的实际情况来看,英方在日本的压力下最终决定封锁滇缅路3个月,确有不得已的一面,是在面对德国进攻的巨大威胁之下,无力再在远东应对日军挑战的自保行为,而不是有意站在日本法西斯一边压迫中国、助纣为虐。在封锁期间,英缅方面实际上对于中方有不少暗中的通融和协助,为中方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使得禁运的效果打了不小的折扣,而且,3个月后如约重开滇缅路,日方完全掐断这一中国生命线的企图落空了。

三、日军暴行的记忆与叙述

本次会议有三篇论文围绕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的记忆与叙述进行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以《董显光与战时南京大屠杀影片的海外传播》为题,梳理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董显光与南京大屠杀影片海外传播的关系,探讨了约翰·马吉(John Magee)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影片在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功效。七七事变爆发前后,蒋介石认识到全面抗战不可避免,国际宣传工作日益重要,决定起用董显光专门负责国际宣传。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围绕南京大屠杀暴行,组织专人在美国、英国、日本、国联放映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南京暴行影片,对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京大学张生的《历史书写中的七个维度》,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书写为例,探讨了历史书写中谁来书写、写什么、空间、时间、如何书写、为什么、为谁书写等七个方面问题。作者提出,从以上七个方面思考,有助于澄清历史迷雾,逼近历史真相,透视历史事件背后的意涵。以此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可以得到新的发现和思考。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长期关注“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其论文《文献、口述与研究——重建日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总结回顾了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研究过程与成果后提出,经过20多年的时间,在韩国、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荷兰等地“慰安妇”幸存者作证引导下,在各地及联合国等人权组织推动下,加之历史学家、法学家等深入、艰难的调查取证、研究,以及各类历史文献搜集与公布,逐渐重建了日军“慰安妇”的历史。文章对日军“慰安妇”历史中时间与空间、日本政府与军队的关联、慰安所的类型、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规模、“慰安妇”制度的强迫性等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作者提出,在日军“慰安妇”问题上,国际社会基本形成了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将这段反人道的历史写入了教科书。

本次研讨会涉及议题较广,讨论热烈而充分,论文紧扣会议主题。纵观参会学者,多来自于中国、日本、欧美等二战史研究相对发达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视角的交流与讨论,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与会者期待,会议中涉及的战争记忆、比较研究等问题,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与细化。

[作者许欣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